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主体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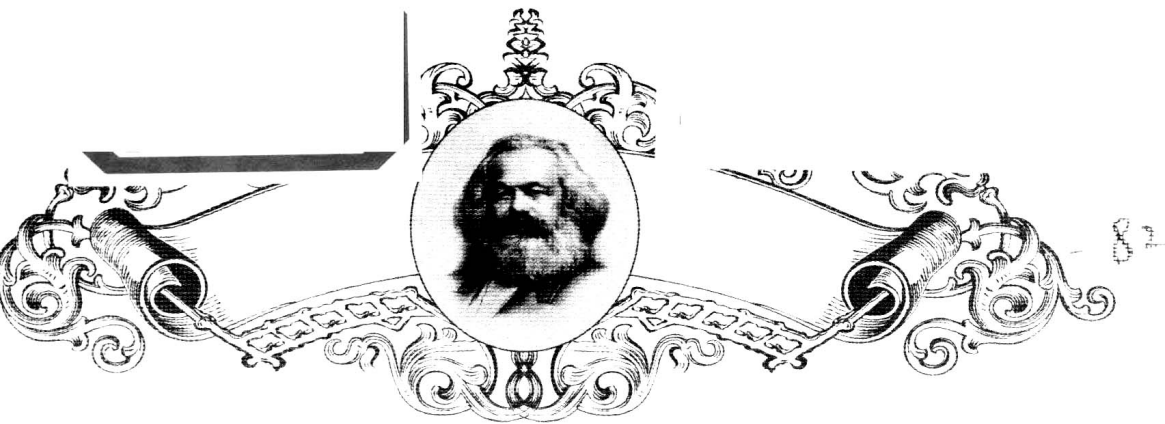
(第三版)

张一兵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主体向度

(第三版)

张一兵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张一兵著. —3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9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青年名家文库

ISBN 978-7-307-07763-8

I. 马… II. 张… III.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IV. 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4546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1.25 字数: 447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3 版 2010 年 9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7763-8/B · 259 定价: 64.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第三版序言

2009年，对我而言肯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10年前完成的拙著《回到马克思》^①将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版，而我在15年前所撰写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则将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版。在此次修订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回眸，和曾有的自己、曾有的思绪、曾有的激动相遇，和曾经目光锁定的人物对话、辩驳。蓦然回首，十余年已逝，虽不能说沧海桑田，也可谓日新月异了。不过，我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的论著能够受到如此持久而深入的关注，业已充分说明一种中国当代思想史中的重要复兴，即与商品—市场经济世界共同体生成的马克思的科学的批判话语的重新在场。这种学术思想情境的建构本身就包孕着十分复杂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完成于1993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是我最早出版的一本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的专题性论著。在2002年的第2版序言中，我简要说明了这本书主要的思想构境逻辑的历史背景。而在这篇新的序言中，我想着重阐述此书生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和中心思想。我以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原创性的学术关键词主要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与主导、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似自然性和物役性。虽然，从1993年到现在，时间之河又缓缓向前流淌了15年有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9年第2版。

余，其间，我已经先后出版了《回到马克思》、《神会马克思》^①等新的论著。可是，今天再次踏上思想归乡的旅途，《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所生发出的深层思想追问依然对我有一种蛊惑，因为它本身充满着巨大的逻辑诱惑力。

总而言之，这本书是为了纠正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中的某些误认：

其一，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基础原则与主导原则之间的差异。经过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诠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的力量颠倒地成为支配社会存在的主导性外部力量的否定性批评，颠倒地被误认为一般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肯定性基础。这是恩格斯去世前曾经严厉批评过的东西。然而，这种错误的观念却成为后来传统哲学解释构架标识的“基本原理”。在本书的讨论中，我首先甄别的问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境中存在着一个复杂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性现实基础的肯定性指认，与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种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主导性力量的历史性指认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这个基础是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出现的。而另一方面，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中，总会有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力量甚至观念历史性地生成为此时社会生活主导性的统治关系和意识形态，比如原始社会中人的自身生产及其原始部族生活中的象征性神话、西方中世纪中的封建政治构架及其神性观念，以及布尔乔亚世界中经济力量的统治及其经济拜物教。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消亡都是历史性的。马克思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物化关系的批判话语。传统哲学解释构架的错误，是不能界划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

^① 张一兵、蒙木佳：《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这两种不同语境所形成的不同参考坐标下的社会历史生活中的基础和主导力量的真实关系。一个多世纪之后，鲍德里亚在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犯了同样的错误。^①

其二，由于受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影响，在过去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人们仅仅将其诠释为一种对社会存在本质和运动规律的客观反映，我则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时，它同时也是一种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最早是由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如果说，在1845年开始的思想革命中，马克思从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中摆脱出来，开始基于客观现实观察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真实进程，这的确开辟了一条新世界观的科学的客体向度，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开辟的这种科学的客体向度的基础上的探索，却恰恰以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主体获得解放为最终目的，这是他们从未背离舍弃，一直密切关注的人类生存情境的主体向度。当然，强调这个科学的主体向度并非是重新回到哲学人本主义的主体哲学逻辑，所以，界划我的观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派的异质性则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其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力量暂时地、历史性地成为支配人类主体的主导力量，这是一种历史性生成的经济物役性现象；而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自发社会现象，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似自然性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路径里，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否定地和批判地指证这种异常的物役性和似自然性现象，并期冀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有可能扬弃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历史性“颠倒”。可是，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却把这样一个特设的否定性的理论观点泛化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因此被（错误）解释成一个不以人类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实，马克思

^① 参见张一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隐喻为与自然界运动相类似时，这种认知在本质上又包含了更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它恰恰是与他确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相一致的。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说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正是为了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自然界（动物），还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开始。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并没有看到马克思这个分析的深层含义，而是“望文生义”，因此简单地将这个论点从表层语义上推广开去，所以把马克思仅仅限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畸变误释成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新的理论追问和反思，我最早是在1988年《天府新论》第1期上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永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吗？》一文中提出的。这一问题提出后，立即在国内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①此后，我又在《哲学研究》1992年第2期上发表《析马克思社会历史似自然性特设规定》一文，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讨。

以上这些理论要点，就是我15年前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提出来的基本理论观点。

在本书的第3版修订中，没有对其中的基本观点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动，只是修订了部分文字和重新校订了引文。在此次修订过程中，孟庆彬、陈鹏同学在文献校订方面付出了许多劳动，罗慧林博士在全书的文字修订上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当然，特别要感谢的还有武汉大学出版社学术分社的陶佳珞社长和其他编辑老师，没有他们尽心尽力的努力，就不会有此书的重新再版。

张一兵

2008年岁末于南京

^① 从1989—1992年，国内《哲学研究》先后发表了陈志良、杨耕、刘森林、王贵明、陶福源、胡承槐的多篇相关主题的讨论文章。此外，王金福还在《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上发表了同主题论文。

第二版自序

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最大的欣慰莫过于看到自己的思想得到关注，或者说莫过于知道还有人需要了解它、批评它。得知这本完成于1993年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能够再版，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在这静谧的夜晚重新翻阅这本书，记忆也随着繁复的书瓣一层层舒展开来。

岁月骎骎，生涯碌碌。回想起来，十多年前动手写这部书稿时，我正处于“回到马克思”思想实验进程的中期。那时，固然已将汉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相关文献反复阅读，并且也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论著的文本学研究中初尝甜头，可遗憾的是，我既没有注意到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最新的资料群，也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性文本解读方法。虽然信誓旦旦说要“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也在马克思关于自然历史过程理论方面有一些专题性的见解，但从理论构架的深层看，我的理论话语最终依然濡滞于旧体制的泥潭之中。也许，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焦点意识与支援背景上的隐性悖结。若要讲清楚这一点，我必须先简单地对自己的哲学理论思考与研究历程进行回顾。

或许人们还依稀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学术界的理论反思与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相呼应，也努力试图摆脱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给人们的思想所带来的阴霾。出于对“文革”时期“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满，不少学者要求从“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斗争哲学’”回到“文革”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去，这算是一种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场地廓清。可是过了不久，即1982年，在桂林召开的“现代自然科

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讨会上，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俞吾金、吴晓明等七位青年学子递交了一份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思考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思想语境中振聋发聩的问题：我们一度认为绝对正确并试图“回到”的所谓“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个凝固化的体系？面对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和西方哲学，它本身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个在传统惯性思维之外的扣问，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学者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理论界的一大“事件”。尽管后来事件的结局在人们的期待视域之外，但这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萌发新的思考的契机。

另一件在我思想深处产生巨大冲击的事情，可能要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牵头举办的几期轰轰烈烈的关于“哲学现代化”的讲习班了。这次讲习班开办了三轮，从北京开始一直举办到了外地。讲习班的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中国哲学理论界的中青年学者。当然，这里的“哲学现代化”是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背景与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的“三个面向”有关。相关课程基本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首都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担任主讲，讲座的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当时的一些重要发展。在为期不短的学习过程中，每一次讲座的开场白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言说：“三十年一贯制的苏联斯大林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改革发展。在面对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哲学应当现代化。”但事实上，贯穿所有讲座的中心意图和操作路径仍然无非是在原有的理论体系中注入一些新的概念，在内在思想逻辑上依然不能摆脱窠臼。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做法在当时却是极具革新意义和理论魅力的。

正是在这种双重冲击的影响下，我也曾一度立志专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

首先，我密切关注、认真观察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现代认知科学等新兴学科的讨论，并热衷于将诸如系统论、复杂性科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新观点与“马克思”（实际上是传统教科书体系的诠释结果）的基本原理作一种有机嫁接的“马克思当代化”的尝试，而

且也发表了一批制造了“实践场”、“实践格局”、“实践构序”、“实践功能度”等很多新名词的文章。但是，思维之井越往下挖掘，我就越感到了理论维度开拓的艰涩。这种困难并非来自技术的原因，而恰恰源于自己作为现成基础的“马克思”话语开始发生动摇。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处于“在手状态”的马克思的理论话语，并不能真正在逻辑深层上与已经发生深刻质变的当代自然科学直接联接起来。正是这种理论逻辑上的困窘，使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原有的那个我们毫无疑义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体系哲学。我必须甄别，究竟是不是马克思的理论真的出现了问题。这当然无异于对自己脚下理论土地的坚实性发出质疑。而我也深知，这种怀疑一旦得到确证，便会宣告我们的研究学统内言说马克思的全部传统基础的非法性。这无论对我还是对其他学者特别是那些一生为之奋斗的理论前辈而言，都将是不同意看到的结果。然而，事实总会以它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展现出来，哪怕这方式本身对于它的承受者来说是如此无情。

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反复的思考，我发现，被我们继承下来并已经中国化了的前苏东模式的教科书体系的正确性——或者，至少其逻辑话语基础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未被证明的预设。在人们的心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厦在（拥有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苏东学者那里已经全部竣工，我们要做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在这个构架中增添些中国特色的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具体环节的工作而已。而今天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现代化，也就是将这个现成的体系哲学的“基本原理”与自然科学新概念、西方当代哲学文化进行外在的拼接罢了。于是，在这种前提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新发展”，就常常会表现为某种现成体系内部子结构重组加新概念的赝品复制过程。然而，在理论逻辑上不证自明的前提有时恰恰是最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我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逻辑并不是一个真的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简单向前发展的“当代性”问题。如果仅站在过去那种教条主义成见的基础上去发展它，无论它的结合对象是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西方哲学新潮、当代社会实践前沿抑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新现实，其结果必

然是事与愿违，它或者结出更为怪异的理论产物，或者从根本上绕开马克思主义而无所凭依。用这样一种东西去充当马克思主义真理以指导改革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坚信，如要真正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理论新问题，首先就必须有一个对马克思理论逻辑的历史视域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乃至兢兢业业进行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过程。这也是那些年我突然“回到马克思”原初的动因。

其次，更重大的打击来自我在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涉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的思想遭遇。尽管在90年初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名为《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的小册子，但那却是我更为深层的理论不安的发端。在那本书中，我俨然以一副站在马克思正确立场之上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面貌，居高临下地论说他们的种种不足。但是，我在内心里却已深深地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困窘。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论者的理论逻辑是将马克思的批判话语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嫁接起来，建构出种种在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主流之外的激进的反抗话语，而这一切又真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精心解读之上的。我曾经指认过：

如青年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前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的理解；弗罗姆在撰写《马克思人的概念》一书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施米特创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认知；而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学的重要成果。^①

撇开他们可能被证伪的深层解读构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认认真真研读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的文本，而仅

^① 参见张一兵：《深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着眼于他们显性的结论，是很难准确判定其是非曲直的。所以，此时我已经开始质疑自己这种“批判”的合法性了。因此我进而意识到，关于开拓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视域新的深度和广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己内功的加强。这同样需要我们完成“回到马克思”的历史任务。

其三，为了避免刚才我所指认的理论困境，人们也还有一个逃脱式的逻辑选择，即简单地宣布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在不对马克思哲学理论历史地平进行廓清的条件下，独立地构造一个新的体系哲学，然后站在这个体系范围内自说自话，而不去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当代性世界文化进行“短兵相接”的交锋。这实际上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的做法。这种理论特征在自己的理论实践中则体现为我一度也肯定的“实践唯物主义”话语。尽管在我后来看来，它实际上是一个仍然深刻地受体系哲学制约的不成功的作品，但当时却着实让我欢欣鼓舞了一阵子，并不遗余力地为其大唱赞歌，宣称“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伟大的革新。可很快我就察觉到，即便在同一个建构“实践唯物主义”的口号下，不同论者要表达的理论倾向其实大相径庭。更有甚者，还有人随心所欲地建构各种各样的新体系，诸如“人学”、“类哲学”或者“实践人本主义”，并直接将这个体系哲学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然而，我的问题是：这种指认是否有真实的根据？或者它只是假马克思的名义言说自己的哲学观念？这个自省足以使我不再制造诸如“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之类的体系哲学话语，因为那不过是一种理论僭越。

至此，我已经充分自省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把握还是不深入和不全面的。如要能够和“当代”对话，能够把马克思推向当代，能够以一种正确的立场回答和解决新问题，就需要完成的一个历史性任务——对马克思基本理论地平的重新廓清。尽管我已经预期它可能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理论工程，可是，事实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

20世纪80年代末，我已经开始系统地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

本。但在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如何实现这个理论工程的独立思考路径，虽然我已经明确拒斥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但更吸引我的还是具体的理论观点论争，而非新的解读方法和异质性的研究视域。这一点是在后来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才实现的。^① 具体地说，此时我关注的焦点还是早在80年代中期就为自己所注意到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即学界在对马克思社会自然过程理论的传统理解中存在着某种重大的理论误释。明明马克思、恩格斯在面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类似自然界盲目运动的自发经济社会现象（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力量成为支配人类主体的主导力量这种历史情形）时，都是在否定和批判的语境里指证社会历史发展中这种异常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期冀着在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之中，将有可能扬弃这种特定的主体与客体“颠倒”的历史现象，可是，到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这个特设的理论观点却被误释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所谓的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就被错误地诠释为全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状况，由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被解释成一个不以人类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我又发现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中，围绕着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正好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即从青年卢卡奇一直到萨特的人本主义流派与从阿尔都塞一直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流派之间出现了异质性论断：前者是所谓从主体出发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则具有从客观规律出发的实证性理论倾向。在这两种极端的理论观点中，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被“一分为二”，或是仅仅强调历史主体性和批判性，或是仅仅凸显社会存在中的客观物质决定因素，导致了一种形而上学式的逻辑对峙。

针对这种理论困境，我把当时的理论目标设定为寻求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完整视域：即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又能在此基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础上重新高扬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批判精神。用我当时的提法就是：“既科学说明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又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和客观必然性。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应该是由历史地肯定人类主体作用的历史辩证法与坚持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统一。”同时，为了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主体观，我将自己的理论努力狭义地确定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其中，我原创性地提出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首次确认了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中的基础性与主导性因素的问题，并第一次提出了似自然性理论与物役性理论，并分别从发生学历史研究、专题研究思考等多重视角讨论了这个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而今返观，似自然性理论与物役性理论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论辨识。因为惟有通过确立似自然性与物役性范畴，我才得以校正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个重要论见的严重误释，同时也力图把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片面分裂为理论逻辑主体性和客体性两极的历史辩证法重新统一起来。应该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种理论努力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时至90年代初，我获得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的青年项目，主题是“马克思自然历史过程理论研究”。自然，这也成为我写作本书的直接动因。

然而，必须指出的问题是：第一，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还是不成熟的。虽然我在第一、第二章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演进的描述中，也采用一定的历史性分析和文本解读的方法，可这显然是不完整和不规范的；第二，我尚未掌握MEGA2最重要的新资料，特别是尚未接触到与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转换真实语境有关的大量经济学笔记；第三，在对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理论的分析研究中，我仍然耽迷于后来自己明确批评过的同质性专题“撮合”法。这都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批判性甄别对待的。如果有可能，读者们将这本书与我紧接其后所写的另一本书《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起对照阅读，阅读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次再版，我完全保留了该书的历史原貌，只是对文字进行了

少许润色，纠正了一些明显的排印错误，重新校正了注释和参考文献。吴雨芳老师和我的学生吴静、蒙木桂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此对她们的劳动表示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此书是由他们于1995年首次出版的。同时，也要衷心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作为本书编辑的黄继东老师，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使此书有机会得以再版。

应该说，作为身处两个世纪交替间的人是幸运的，而能作为遭际千年更迭的人更是幸福的，可我们居然同时拥有了这两种机会。人生如朝露。逝者如斯夫。难道这还不足以让我们感叹自己生存的有限吗？在这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未来充满希望，让我们共同努力，以证明自己作为东方思想者的真在。

张一兵

2001年2月10日于武昌何家垅

序 言

从大约 150 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围绕着它的争论就几乎没有间断过。赞同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自不必说，就是在赞同者这一边也始终没有达到过理解上的一致。不过，各种分歧之间，其情形和性质又不一样。有些分歧是正常范围内合理的分歧，彼此间虽有是非，但并不掩盖在基本取向上的一致。这一类分歧是大多数，属常见的。而另一类分歧则超出了上述的合理范围，分歧的一方或双方，于有意无意之间，在争论中渐渐地拉开和扩大了立场上的距离，以致在基本取向上形成公开的对立。这一类分歧是少数，不常见的。对于前一类分歧，我们应取的态度当是：宽容以待之，虚心以受之，以便达到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相得益彰的效果；而对于后一类分歧，我们应取的态度则当是：务必分清是非，决不在基本立场上求妥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态和变化不仅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而且也强烈地受到社会思潮变迁的影响。它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剧烈动荡的变革时期和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它也经历了政治上的进攻时期和退却时期，经历了战略目标的变换和工作中心的转移。而每当面临这种被赋予了时代特征的战略转变时期即将发生或开始实现的时候，就必然伴随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实践的分化和重组，伴随着政治观念的更新与变革。为了促成和解释这种变革，人们必然会提出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兴起的我国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讨论热潮，就是在这种战略转移时期进行的。当然，就其背景而言，它还受到由

于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而形成的冲击和影响。

必须看到，历史无论怎样迂回曲折，它总是在沿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撤出旧的阵地是为了发展和巩固新的阵地。战略任务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最终目标的放弃，也不意味着要在思想上把先前奉为政治实践原则的那些理论观点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谬误并统统地加以清洗。一切都必须用宏观的变化着的历史的眼光来考察，要更多地面对实际，面对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凸现出来的主要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从而考察成为这一时期主导哲学精神的那些理论原则和理论观念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这个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转折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执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它指导和规范着人们的历史实践，同时又在人们的历史实践中丰富、改造和发展着自己。不过，这种发展不是要全部地否定过去的历史，更不是要根本地改变它的原则。因此，在面临时代变革，必须大规模地迎接接踵而来的历史的新挑战的时候，率由旧章，保持原有的一套，拒绝作新的探求和适时的变革是不对的，而借口这种探求和变革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或偷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导原则更是不对的。遗憾的是，从我国理论界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两种倾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任何发展都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回，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